

国防教育知识文库·国耻国难卷

总策划：王启明

策划：陈贵林

吴海章

主编：孔令铜

副主编：文若鹏

血 溅 京 津

——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实录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国防教育知识文库·国耻国难卷

血 溅 京 津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实录

编著

朱 陈

政 器

军事谊文出版社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12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溅京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实录/朱政等编.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1

(国防教育知识文库·国耻国难卷)

ISBN 7-80150-012-1

I. 血… I. 朱… III. 八国联军—侵华—历史—通俗读物 N. K25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696 号

书名:血溅京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实录

编著:朱政 卫兵 陈器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天利华印装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版次:1999年1月第1版

印次: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4.625

字数:104千字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 7-80150-012-1/D·2

定价:48.00元(全套定价)

目 录

引 子.....	(1)
一、谁“得罪了洋人”	(3)
从戊戌变法到戊戌政变	(3)
立大阿哥,洋人不满意	(13)
义和团兴起,洋人发兵	(18)
二、挡不住的船坚炮利.....	(27)
一个骗局.....	(27)
“宣战”以后.....	(32)
大沽失守.....	(39)
三、津门泣血.....	(45)
攻占天津.....	(45)
津城蒙难.....	(56)
四、进犯北京.....	(66)
京郊烽烟.....	(66)
北京失陷.....	(74)
五、慈禧西逃.....	(84)
慈禧太后逃跑.....	(84)
西逃途中.....	(88)
慈禧妥协.....	(96)
六、天朝成地府	(100)
强盗的世界	(100)
揭开伪善的面纱	(108)

“洋兵杀人无数”	(112)
七、洋人的朝廷	(118)
洋人“讨价还价”	(118)
空前的“卖身契”	(125)
清廷大臣鲜血铺路	(129)
八、泱泱大国的奇耻大辱	(135)
克林德碑的由来及变迁	(135)
清华学堂的由来及变迁	(140)

引 子

炎黄子孙的屈辱史中，深深地刻着这样一个岁月——1900年(庚子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是在首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奇耻大辱中进入二十世纪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八国联军侵华，是二十世纪震撼世界的第一件大事。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告诫我们：“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

12万八国联军，在中国的广阔大地上制造了举世震惊的烧杀抢掠的悲剧。八国联军从塘沽登陆，强占天津，一路抢杀到北京。在那令人发指的岁月里，在以京津为中心的大半个中国里，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是横尸遍野，江河血流，天朝成地府。从塘沽到天津“无华人足迹”；“整个天津城大街小巷尸体横陈”，惨不忍睹；千年京都火光冲天，清廷出逃，百官被杀，千万人头落地，几万件奇珍异宝被抢劫一空，数万中国妇女被污辱，中国人民受尽了侵略者的蹂躏。列强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死人试图反抗，他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他们杀人放火，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列宁《论沙皇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就是当时中国苦难岁月的真实写照。

清政府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卖身契。帝国主义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敲诈，从此清政府变成十足的“洋人朝廷”。一纸条约，列强们

勒索近十亿两白银，那是四亿中国人民的血与汗。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历史是不允许忘记的。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

一、谁“得罪了洋人”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缘由

从戊戌变法到戊戌政变

甲午战争后，一个新的爱国主义高潮在神州大地兴起。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爱国维新志士，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开始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发动了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由于运动的高峰是一八九八年，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因此被称为“戊戌维新”，或叫做“戊戌变法”。如果从这次运动的酝酿准备算起，即从它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其起点可以上溯到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

回顾一下“公车上书”的起因，还需从 1894 年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说起。

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日本原是一个像中国一样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自从 1854 年美国用武力强迫打开它的门户之后，德川幕府（1603~1867）相继同美、英、荷、俄、法等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连绵不断。1868 年 1 月，日本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 15 岁的睦仁天皇。这一年，睦仁改元“明治”，称明治天皇。接着，明治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日本近代史上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历史上称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建成了当时亚洲惟一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然而

天皇政府是一个军国主义政府，在“富国强兵”的总方针指导下，加紧进行军制改革，建立和扩充适应近代军事的强大军队。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看到清朝政府在中法战争中怯懦的表现，主张“快速占领朝鲜，然后与中国一战”。90年代初，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这时，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眼中，为了摆脱危机，除发动侵略战争外，无路可走。就这样，1892年组阁的伊藤博文，便抓紧了侵华战争的临战准备。

而此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前数十年间，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改革和自强措施。然而，却与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发生在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军的军事力量，并针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进行了一定的防御准备。但由于这个运动始终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因而既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富强问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局面。直到甲午战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制度仍然禁锢着整个社会，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极大束缚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政治热忱和军事行动。

当时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1898年“亲政”以后，仍然受慈禧操纵。但光绪帝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前夕，他多次提醒“太后”多做几手应急准备，以防不测，但慈禧却置之不理。更可悲的是，她竟然挪用海军装备经费大修颐和园，筹备60大寿庆典。光绪帝看到她大兴土木，毫不顾及大清王朝，想再次壮着胆给太后进言。

有一天，慈禧太后问光绪：“颐和园的工程进展顺不顺，选个好日子，我想去看看。”

光绪帝看到机会来了，立即说：“进展很顺，只怕那海上的匪盗要来捣乱，下几条圣旨，我把他们挡在海上，也好让大庆一帆风顺。”

“你又提那小日本，我知道了，他们比法国人强。即使窜进来，迅速和解了结，免得耽误做寿。”

光绪帝不敢公开反对，只好示意亲近朝臣，多上主战的奏折。

甲午战争爆发后，后党主和，帝党主战，帝后党之争此伏彼起，和战大计动摇不定，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后党中坚人物李鸿章，实际上总揽朝廷军政、外交大权。他与慈禧沆瀣一气，战前一直坚持“息事宁人”、“以敌制敌”的消极方针。同时李鸿章对当时国际形势作了错误估计，军事上毫无布置，想借外国公使从中调解，用“和说”之客，代替退兵之计。战争爆发后，后党仍然竭力求和。当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土，列强害怕后来的日本影响他们各自在华的利益，便在背后酝酿“调停”。李鸿章惟恐失去良机，想尽办法诱使外国干预。日本也意识到“外国干预”的不利形势，便速战速决，主张无论占领什么地方，都很必要。接着旅大、威海连陷，辽东清军全线溃败，后党更加一意孤行，终于割地赔款，乞和求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清朝政府自1842年《南京条约》后，迄此为止所签订的最屈辱的卖国条约。条约共11款，另有附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割让台湾全岛及辽东半岛、赔款2万万两、允许日本在中国“任便从事各种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这样一个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的条约，中国人民是不能容

忍的。马关议和、割地赔款的消息传出，就像一场大地震，引起全国各阶层的极大惊骇。“堂堂大国”，败于“蕞尔小国”。清政府鼓吹的“中兴”，洋务派搞了30多年的“自强新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人们悲愤交集，爱国主义的激情无比高涨。台湾人民听到割台的消息时，“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他们“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野”，还鸣锣罢市，纷纷集会，愤怒抗议清朝政府的卖国行径。

4月15日，中日和约即将签字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野上下，舆论哗然。当时正在北京准备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群情激愤，在康有为的倡议鼓动下，梁启超首先联合广东籍举人100余人向朝廷上书拒和，这一行动立即得到湖南籍举人的支持和响应。

4月22日，两省举人同日向都察院呈递。从这一天起，到4月30日，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广西以及山东、河南、云南等省举人，也都分别相继上书。但是这些上书都被顽固大臣所阻，“书上数日不报”，毫无结果。于是，康有为又联合18省举人在宣武门外陶然亭松筠庵集会，发动联名上书。康有为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要求拒绝和约、迁都再战、变法救亡。在万言书上签名的举人约1300人，于5月2日向都察院呈递。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可是，都察院以条约已经签字、又经皇帝盖了印为由，拒绝转递，这次上书并没有送到皇帝手中。

提到“公车上书”，不能不说说康有为。康有为生于1858年，1927年去世。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人称南海先生。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是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79年，他游香港，眼

界大开,才知道西方人治理国家依据的是法律制度,不能用老眼光把他们当成野蛮民族看待。于是,购买了许多介绍有关西方的书籍,并进行学习研究。后来,又在香港、上海陆续收集到当时出版的外国书籍的中文译本,还读了一些早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的文章、著作,由此而获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自然科学的启蒙知识,使他逐步具备了后来的变法维新思想。

“公车上书”就是他发动、组织和领导的。其实早在1888年,他利用到北京应试的机会,就曾勇敢地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在这次上书中,他对皇帝说:“现在中国非常衰落,四境虎狼四起。日本窥伺吉林,英国觊觎川藏,俄国想在黑龙江修筑铁路,法国则在云南和广西一带袭扰。眼下只有通过变法,才能国富民强,使朝廷在危机中强盛起来。”这份充满爱国激情的上书,不仅没有递到皇帝手中,而且还惹恼了守旧的大学士徐桐。他这次考试名列第三,徐桐知道后说:“这种如此狂妄的书生,将来也难结正果。”就给除了名。这是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前的第一次上书。两次上书受挫后,并没有使康有为灰心。1895年5月和6月,他又向光绪皇帝两次上书,也是康有为第三次和第四次上书。

第三次上书,康有为继续发挥“公车上书”的变法主张,提出了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条自强雪耻之策。他还特别强调了为实现变法选拔人才的重要性,并尖锐地指出,国家如此危弱,如不下决心进行改革,不“大讲变法,是坐等待毙也”。这次上书算是送到皇帝手中了,引起皇帝的重视,下令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但各省督抚拖延搪塞,上书仍然没有结果。第四次上书则因工部堂官拒绝转递,没有上达。

康有为的四次上书,尽管只有一次送达光绪皇帝,但已经

使他感到有了希望。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开始了紧张的宣传组织活动。虽然维新派的报纸宣传，还局限于温和的改良要求，学会一类的爱国组织也缺乏集中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但这些报纸和学会组织的出现，打破了封建专制统治下腐败沉闷的空气，启发人们去探求爱国救亡之道，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随后，维新派和顽固派、洋务派进行了一场长时期的论战，在两千年来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上打破了一个缺口，把维新变法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俄占旅大，英占威海卫，法国强租广州湾。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越见紧迫，维新变法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迅速向前发展，1898年达到了顶峰。

1897年12月，康有为又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这是康有为第五次上书。他一开始就痛述局势的险恶，在指出了摆在眼前的严重民族危机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斗争形势后，向光绪皇帝指出，如果再不变法，国家必将沦亡，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这次上书为工部大臣所阻，不允代奏。光绪皇帝没有见到，上书又落空了。康有为准备离京南归。这时，都察院的一个官员夔曾上折推荐康有为，请求光绪破格召见并授以重任。但由于恭亲王奕訢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为理由加以阻挠。光绪只好命总理衙门传见康有为问话，并谕令康有为如有所见及有著述政论等，都可以由总理衙门代为进呈。这样，康有为在总理衙门传见问话后，于1898年1月29日向光绪皇帝再次上书，进一步阐述他的维新变法主张，大声疾呼：“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不变仍亡。”要求光绪皇帝下决心迅速实行变法。这次上书成为康有为的

第六次上书。

第六次上书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又积极活动起来，加紧推进变法维新运动。他们成立“保安会”，创办《时务报》，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要求朝廷维新变法，救亡图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

光绪皇帝看到这种形势，心中着实有点高兴。因为西太后与长大成人的光绪，早在甲午战争前就为操纵朝政矛盾重重，并形成了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两派政治势力。光绪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实行变法，把朝廷的大权从西太后手中夺过来，使中国得到振兴。

一天，光绪对军机大臣奕劻说：“太后若是再不给我实权，我宁愿退位，也不愿意当亡国的皇帝。”

奕劻把光绪的这番话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大骂光绪“负心”，并说：“他不愿坐此位，我也早就不愿意让他坐了。”奕劻见西太后动了气，赶忙进行劝解，并说皇上现在心里正热，强行阻挡，恐怕不好。

听了奕劻这些话，老奸巨猾的西太后也觉得变法正在深入人心，光绪已在维新派中取得很大影响，只得暂压怒火。西太后沉思了一会儿，又说：“也好，那就由他去吧，等他搞不出模样再说。”

事后，奕劻去见光绪皇帝，并没有把太后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只是说：“太后说了，就随皇上的意思去办吧。”

1898年6月11日，在维新变法潮流的推动下，光绪皇帝终于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实行新政，从此变法运动进入了“百日维新”的阶段。

维新派一心期望通过皇帝的权力，自上而下地以改良的

办法实现他们维新救国的大业。但从6月1日光绪皇帝下诏变法起，他们越来越发现，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他们依靠的皇帝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雷霆万钧”的力量。他们哪里想到，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变法运动，和封建反动势力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光绪皇帝决心实行新政，又加剧了封建统治者中太后和皇帝的权力之争。百日维新开始后，矛盾日益尖锐，斗争更加复杂了。正当维新派为争取到皇帝下诏变法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握有军政实权的封建反动势力，已经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镇压维新变法运动了。

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的第五天，西太后迫使光绪下了三道谕旨，一是免去翁同和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把他送回常熟老家去养老；知情人谁都明白，翁同和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在朝廷里长期担任要职。罢翁同和的官，目的是削弱光绪皇帝的力量；二是凡新命二品以上大臣，授职时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表面看来这一条只是朝廷中的礼仪问题，实际上，当时光绪皇帝已经亲政，大臣授职已不必到太后那里谢恩了。慈禧之所以这样做，是为更便于观察朝廷大臣的动静，加以控制；三是迫使光绪下令授予慈禧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又予实授，并兼北洋大臣，统率精锐的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支军队，牢牢地控制着京畿心腹要地。这样，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成为慈禧以后发动反动政变的得力心腹。形势日益紧张，新政的推行也极其困难。

光绪皇帝虽然是一个封建皇帝，但也是一个比较能接受新的思想和多少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为了克服阻力，他毅然惩处了一些顽固大臣，大胆起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四品卿衔的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事宜，作为推行新政的助手，加紧推行变法。他采取的这些组织措施，加剧了慈禧太后

与皇帝的权力之争。

慈禧太后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动势力的著名代表，她自1861年发动辛酉政变走上政治舞台后，就一直紧紧抓住统治大权不放。她之所以选择光绪继同治为皇帝，是因为要继续以皇太后的资格取得对政权的控制。光绪皇帝不满于做一个傀儡，想要做一个享有实权的统治者。他企图获得维新派的支持，并通过维新变法而获得真正的权力。慈禧太后则根本容不得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任何改良主张，也不容许光绪皇帝越过自己搞什么有利于维新派的改革。因此，维新派与封建守旧势力的斗争，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权力斗争交错复杂，当维新变法运动进入百日维新阶段后，就更加尖锐，更加突出了。慈禧太后感到维新变法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权力，就更加加紧策划政变，以镇压维新变法运动。

9月中旬，北京盛传慈禧太后要到天津阅兵，并且要废掉皇帝。光绪皇帝感到极大的威胁，连续发出两道“密诏”，让康有为等人迅速密商，设法相救。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看到两道“密诏”，知道光绪皇帝处境危险，惊恐万分，抱头痛哭，同时感到变法到了危险关头。

但是，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在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情况下进行的。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也不可能从人民群众中去寻找力量。康有为、梁启超等在面临反动政变危机的面前，一筹莫展，他们想到了袁世凯，相信定能得到袁世凯的支持，这就可以借重袁世凯掌握着一支千人的武装力量，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对抗，必要时依靠袁世凯除掉慈禧太后这个大障碍，保住他们的“圣主”光绪皇帝，使危局得到挽救。

他们在作了这种错误估计后，就向光绪皇帝推荐袁世凯，

请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并予袁以重用。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等的建议，召见袁世凯，并赏给袁世凯兵部侍郎的头衔，准备进一步加以重用。

鉴于事机紧迫，18日晚上，年轻气盛的谭嗣同深夜密访在京等候皇帝召见的袁世凯，要求袁世凯举兵杀掉荣禄，进京包围慈禧太后的住处颐和园，以救光绪皇帝的危难。在袁世凯的官府里，谭嗣同与袁世凯曾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谭嗣同对袁世凯说：“您对皇上的意向如何？”

袁世凯回答道：“他是绝代的圣皇，我们只管孝忠。”

谭嗣同听了内心一阵高兴，就对袁世凯说：“今日能教我圣上的，天地之间，惟独您了。只要您愿意，什么事都好办。您如果不愿意，可以到颐和园向西太后告我，用我的人头，您可以换得富贵。”

袁世凯听了有点不高兴，一看到眼前年轻人一腔热血，又不好直接发作，便装着很可靠的样子说：“你错估计我了，我袁世凯是什么人，谁还不知道？圣主就是我的亲爹，我不去救他，这个责任还交给谁？我与您在非常时刻共谋大事，要说这责任，该由我俩共同担当才对。”

当谭嗣同提出让他派兵杀掉荣禄的时候，袁世凯说：“拿下荣禄如诛杀一条狗！”

……

光明磊落的谭嗣同天真地相信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可是，两天后，袁世凯一回到天津，立即向荣禄报告了谭嗣同夜访的全部内容。维新派就这样被出卖了！

荣禄听了袁世凯的报告，大吃一惊，立即上了一列专车，连衣服也没有来得及换，就赶到北京，直奔颐和园。

西太后见荣禄一副紧张的样子，故作镇静地问道：“难道